

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及其特征

孙 立 平

目前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以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为单位进行的。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是不同民族国家为实现现代化所做的各不相同的努力, 是一些国家已经相对地实现了现代化, 而另一些国家甚至还没有走上现代化道路。本文更倾向于将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囊括了所有国家与民族的全球性变革过程。之所以如此, 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 现代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 这是一种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第二, 只有把现代化看作是一种全球化进程, 我们才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演变的意义上把握这场人类历史上伟大社会变革的实质。

第三, 将现代化看作是一种全球性进程, 可以使我们将具体某个国家的现代化置于这个过程的总坐标中, 分析它的时空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特征和特殊的制约条件。

本文将基于这个出发点, 对全球性现代化进程所经历的不同阶段描绘出一个基本的轮廓, 并对各个阶段的特点及其所蕴含的意义做一概括的分析。

第一阶段: 西欧现代化的发端

现代文明最初发源于西欧, 对此在学术界大概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但对这种现代文明究竟在欧洲发端于何时则不免各持己见。笔者也曾认为, 现代化是始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但过后思之, 虽然将这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未尝不可, 但如果非常明确地将这作为现代化的具体起始点, 未免有些武断。实际上, 现代文明的出现, 是一个由积累而来的逐步过程。其直接渊源至少可以上溯至1500年前后。

许多学者, 特别是一些著名历史学家都对1500年前后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给予特别的重视。如果我们将1500年作为分界点, 就可以看到1500年前后的两个西欧的强烈对比, 以及在这段时间里西欧所发生的重大变化。1500年以前的西欧, 诸侯之间征战不已, 一个诸侯的领地就是一个独立王国; 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日尔曼人的南迁, 使商路中断, 经济萎靡、手工业和商业萧条, 80%以上的人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 宗教神学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而且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 它不仅窒息了社会的生机, 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在外部关系上, 虽然欧亚之间的奢侈品贸易始终未断, 但总的来说, 欧洲自身是封闭的。

1500年以后的欧洲面积则与之迥然相异。在诸侯征战的废墟上崛起了新的民族国家, 国王的专制日益强固, 而诸侯的力量则日渐黯然失色; 工商业表面上是在恢复, 实际上则是以更大的蕴力将自己推向前进, 它不久就向人们表明, 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的生成; 在沉闷的宗教神学殿堂, 各种异端向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发生强有力的挑战, 开始时人们或许还以为

这不过是新教派的出现，但不久人们就意识到，这是新的文明意识在启蒙；在蔚蓝色的大海上，帆影点点，它带回来的不仅是掠夺到的财富，还有关于海外的新信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西欧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纽带织成了。

1500年前后，作为现代化源头的另一种意义还表现在，一系列无论对欧洲还是对世界都有重大历史意义，同时亦对现代社会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事件都是发生在1500年以后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在1500年前，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者即开始了海外探险，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1500年前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都活跃于1500年前后。1521年，宗教改革开始，这是欧洲人在精神上的一次重要觉醒。20年之后，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加尔文教派，宗教改革声势大壮。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科学革命在孕育。1588年，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获得海上霸权，西欧在海外的扩张进入一个新阶段。1600年，英国和荷兰（1602年）东印度公司成立，其在亚洲的经济扩张声势更盛。1610年前后，凯普勒、培根、伽利略、笛卡儿纷纷创立自己的科学理论。16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处死查理一世，宣布实行共和制。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实行君主立宪制。177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发表《人权宣言》，废除封建制。1830年，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发生革命。1848年，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席卷欧洲。正是在这一系列变动中，西欧历史上的一个旧时代结束，一种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文明，在西欧露出了曙光。

认真分析一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进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结论。

1. 民族国家这一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是现代文明得到形成的前提。

如果回顾一下西欧近代民族形成以前的状况，就可以理解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所具有的意义。英国饱受贵族割据的苦难，仅红白玫瑰战争就打了30年，法国也被勃艮第派和阿马尼亚克的斗争弄得四分五裂。德国和意大利处于分裂状态。分裂与割据造成了混乱与贫弱。但在1500年前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封建王权的兴起。在“玫瑰战争”中，贵族们的互相厮杀削弱了各自的力量，亨利七世乘机建立了统一的都铎王朝，“这标志着统一英格兰的正式出现。”^①法国则是在英法百年战争以后，由波旁王朝建立了统一的政权。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则早在15世纪末即由强有力的君主实现了统一，因此，也就比英法在世界上早领风骚。瑞典则在16世纪中叶推翻丹麦的统治而建立统一国家。在西欧大国中，只有德国与意大利的统一推迟了，而其现代化也大大晚于其他国家。

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只是意味着政治上的统一，同时还意味着如下三方互相联系的内容：一是一种有效的中央政权的建立，二是将原来若干个(或许多个)小的政治共同体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政治共同体，三是尽量消除原有的地域与集团间的差异，建立民族国家的同质。

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不仅为统一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其他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可能性。可以说，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有些论者在分析西方现代化时，只强调政治民主化的作用，而忽略了统一民族国家形成的作用，不能不说有失偏颇。

2. 西欧作为现代化的第一批国家，其现代化具有一种鲜明的“内发”性质。

西欧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没有先例的历史过程，是在自己内部现代性因素不断成熟的情况下逐步演进的，这个过程更切近于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① 赫·约·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2页。

作为一种“内发”型的历史过程，西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主要不是靠对外部文明的“采借”，而主要是靠光大自己传统中的现代性因素与创新。不错，西欧现代化确实是与西亚、北非甚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但这些影响并没有成为后来西欧发展的主导因素，而只是作为一种补充因素。西欧最初现代性因素的来源，主要是来自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中世纪“城市国家”中的现代性因素。对此，哥迈尼将其称为“前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性特质”。^①概括起来说，这种“前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性特质”主要包括三个因素：（1）一种特有的理性经济形式。许多人类学家、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指出过，在当时只有这些地方的经济才不是以消费、威望和权力为目标，而是强调生产本身。也就是说，这种生产的直接目的主要不是用于提高消费水平，不是用于政治、军事、宗教和审美目标，而是为扩大再生产而投资。这是形成一种具有扩张力的“自我维持增长型”经济的最关键因素。（2）以自治和契约为特点的政治模式。在古罗马时代，帝国中央政府的规模很小，在公元二世纪时不到150人。于是城市自治便发展起来。在中世纪市民所控制的城市中，市民自治也是通行的原则，不仅司法和行政是自治的，^②连军队也是自治的。韦伯认为，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使西方的城市国家能建立起真正的公民共同体，这是一种平等的团体，具有独立自主的法人地位。这种政治模式无疑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前身。（3）古罗马的理性的、普遍主义的法律。许多研究现代化的理论家们都认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一种以普遍主义（一视同仁）为特征的行为规范体系，这种规范体系不仅形成一种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是现代社会制度得以运行的最基本条件。可以说，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架就是从这三个方面逐步演化而来的。

公平地说，“前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性特质”虽在西欧现代化初期起过重要作用，但对西欧整个现代化过程起更重要作用的则是创新。因此可以说，原生的“内发”型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创新。对于创新活动的类型、条件和作用早已有人进行过详细论述，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创新与社会结构的性质有着密切联系。一般地说，具有在权力较为分散、社会结构多元化、社会动力系统蕴藏于民间、社会活动单位处于活跃状态的社会中，创新活动才易发生。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明白，西方社会在制度层面上的自由企业制度、民主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自由、竞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都是促进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

3. 海外扩张不仅弥补了西欧现代化中先天不足的条件，而且可以用整个世界来容纳西欧的发展。

在西欧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当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由于贵金属的稀缺而造成的币制不健全。大部分商品交易是以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的，商品交换的范围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限制。但在哥伦布第一次发现新大陆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西班牙人就征服了新大陆中的两个主要帝国，即印加和阿兹特克，并从那里掠夺到大量的金银财宝。这些金银运回到欧洲后，弥补了欧洲贵金属的稀缺，使得普遍的货币体系得以建立。而普遍的货币体系建立后，不仅使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大了，而且使得对成本和利润的计算更加简便，更加容易。^③这就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商品化，改善了技术开发和进行

① 哥迈尼《现代化的社会学》（1981），第22—25页。

②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第45—51页。

③ 兰斯基夫妇《人类社会》（英文版），第266—269页。

投资的条件。海外扩张对欧洲现代化条件的弥补的另一个突出的例证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原材料主要是煤、铁矿石、棉花和羊毛，粮食主要是小麦。除了羊毛以外，这些国家几乎拥有所需的一切。但发生在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这次工业革命所需的原材料主要是橡胶、铜、石油和铝矾土等。这些原材料都是工业国家所缺少的。^①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借助于国际贸易，欧洲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能否发生也是疑问。

然而海外扩张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一种有利于西欧的国际经济格局，从而为西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无尽的潜力。海外扩张、对海外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支配，以及日益增强的贸易关系，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种有利于西方的国际经济格局。从这时候，西欧各国的经济就再也不仅仅是一种国家经济或地区经济，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一部分。它自身所具有的许多局限性（如市场的限制、资源的限制等），可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得到解决。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那段为人熟知的話所指出的：“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②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由西欧第一批现代化国家所促进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不仅使西方国家成为它的受益者，而且这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也成为后来进行现代化国家必须面对的既成条件。

4. 西欧现代化的“内生”性，决定了其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是来自民间。

如前所述，“内发”型现代化是自身内部的现代性不断成熟的结果，而这种现代性的不断孕育与成熟，主要是在民间进行的。这一点在经济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个人主义的、小规模的家庭型的资本主义，在工业化初期是十分流行的。那时不仅国家没有起什么积极作用，而且，资本仍属个人私产，还没有形成团体法人的形式，那时的银行在投资方面不起什么作用。”^③而推进这种缓慢演进过程的，包括工商资本家、新贵族、小商人和自由民。对此，马克思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④这样一批来自民间的力量，不仅成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推进者，而且也在政治变革，以致现代政治体制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内发”型现代化中，另一支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就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对新文化的倡导上。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这三次重要的文化变革中，知识分子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现代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阶段：18世纪中后期的现代化浪潮

卷入这一次现代化浪潮的主要是两类国家，一类是西欧的海外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另一类是欧洲走上现代化道路较晚的国家，如爱尔兰、冰岛、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波兰、匈牙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意大利、丹麦、挪威、瑞典等。由于第二类国家与西欧第一批现代化国家有较多共同点，因此，我们这里分析的重点将

① 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第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2页。

③ 汤姆·肯普《现代工业化模式》，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页。

主要放在第一类国家上。

这次现代化浪潮如果说是以美国的独立战争开始，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走上现代化道路为止，大约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其外部的国际背景至少要注意到如下几点：第一，西欧首批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已经由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央政权的巩固阶段转到政治民主化的阶段。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结束王权的专制统治，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实现了“由绝对王权向多元寡头制的转化。”^①在法国，民主力量和专制力量之间则在用更激烈的手段进行着殊死斗争。虽然中间历经坎坷与反复，但民主政治的实现则是大势所趋。第二，18世纪末，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发生了工业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次革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在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中重构了经济，对政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潜在影响，或迟或早会把这些国家卷入到这次浪潮中来。第三，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民族主义思潮一方面反对内部的分裂，要求建立民族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反对外国的压迫，强调民族的独立性。兴起于19世纪初的民族主义与下面两个因素有直接关系。一是工业革命加剧了各民族各国家间的经济摩擦，“每一个国家都想工业化，所以不能容许外国的制造家在其本国之内插足。一个拥有纺织工业的国家，也不容许设备较好的外国纺织商品进口，以免自己的工业被其摧毁。”^②二是在拿破仑当政时期法国在欧洲国家的侵犯和高压政策，也在受其欺凌的民族中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欧洲民族主义在海外造成的影响之一，是促成了第一次非殖民化运动。第四，西方资本主义在海外的扩张进一步加剧，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日臻成熟。但殖民主义的重点，已经转到亚洲和非洲，并在19世纪完成对非洲的瓜分。在旧有的殖民地中，直接的赤裸裸的殖民掠夺，开始让位于资本统治，不平等贸易成为经济掠夺的主要形式。

所有这些现实的国际条件，都对这一次现代化浪潮，特别是第一类国家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这个大背景出发，分析这一时期的现代化运动，以下几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1. 获得民族独立既是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其现代化的实际起点。

西欧在新大陆及澳大利亚、新西兰所实行的殖民地，有明显不同于后来的殖民主义的地方。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殖民主义时期，始终伴随着大量移民的过程。虽然移民的成分与动机各不相同，但都或多或少地将母国中现代文化的一些因素带到了新的栖息地。这就使得这些殖民地国家早在独立之前，现代性因素就有了较多积累。但尽管如此，这些国家在民族独立之前，是不可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的。因此，这些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摆脱宗主国的统治，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政府。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他们历经约100年的时间，或是用激烈的暴力革命（如美国）或是用较为和缓的非暴力演进（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方式，陆续创造了这种条件。

这种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这些社会的现代化领袖之获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与实现政治的独立的过程交织在一起。”^③也就是说，其现代化的领导人，也就是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在这一点上，这些国家的状况与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情况相类似，

①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101页。

② S·伊斯顿《西方的遗产》，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第六版（译为《西洋近世史》）第二册第118页。

③ 布赖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54页。

与西欧第一批现代化国家的经历则形成鲜明对照。在西欧的第一批现代化国家中，现代化领导人的出现及其巩固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先是封建帝王在建立民族国家、形成中央政权，从而为现代化创造基本前提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成为现代化的真正领导人。这些国家现代化的领导人正是在同封建专制王权的斗争中产生的。而美、加、澳、新的现代化领导人则在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迅速获得了权力。这种差别无疑会使这些国家能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避免由传统领导人和现代领导人的斗争而造成的混乱、曲折与痛苦，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现代化走上正轨。

2. “内生”因素与“示范效应”的双重作为，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说英国与法国是第一批“内发”型现代化国家。那么，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现代化的国家则是最后一批“内发”型现代化国家。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又明显晚于西欧第一批现代化国家，第一批现代化国家的经历无疑对后来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起着示范作用。而作为相对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由于已经有现代化的“榜样”存在，他们可以免去一系列为现代化的先行者所不可避免的创新过程，从而加速自己的现代化。在技术物质层面是如此，在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上也是如此。因此，在这种“后发”的现代化中，往往包含着一系列的引进和“采借”与移植。

然而，尽管第二批现代化国家曾受第一批现代化国家的深刻影响，但第二批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仍带有强烈的“内发”色彩。特别是在现代化不断深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第二批国家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时候，第一批国家的现代化仍处在艰难的探索时期，可以“采借”移植的东西毕竟有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原来西欧殖民地的情况与宗主国有很大差异。

这种“内发”性表现在，与“采借”移植相伴随的，是一系列的创新，即使是在“采借”与移植中往往也蕴含着变异。亨廷顿在对欧洲和美国的政治现代化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指出，如果说欧洲政治现代化的重点是在于权威理性化和结构分化的话，那么，美国政治现代化的特点则是在于政治参与。“美国对政治的独特贡献在于组织民众参政。”^①美、加、澳、新等国现代化的“内生”性，同样也表现在政府的力量较弱，而来自民间的力量占主导地位上。

3. 没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不存在传统与现代间的尖锐对立。

欧洲有着相对悠久的历史。特别是中世纪留下的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以神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是他们在现代化起步时乃至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在欧洲第一批现代化国家开始现代化的时候，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新体制与旧体制、新文化与旧文化、新人物与旧人物的激烈冲突。在英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早在17世纪中期就发生了，然而不久以后发生的复辟使这个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法国的现代化进程更是一波三折，而且其间充满着暴力与流血。第二批现代化国家，特别是前一类国家的情况则与此很不相同。在这些国家，虽然在欧洲大量移民之前也有一些土生土长的文化，但这些文化多很脆弱，在西欧大批移民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这些土生土长的文化大多不堪一击。“北美土生土长的文化，不仅是被征服了，而是整个被摧毁了。”^②因此整个地

^①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23页。

^② 巴勒克拉夫《世界史便览》，三联书店1983年第一版，第413页。

说，这些国家不是那些土生土长的部落文化的延续，而是由海外移民所建立的全新的国家。由于旧的土生土长的文化已经被基本摧毁，这些国家可以说是没有历史的。因此，当这些国家开始现代化的时候，就不存在强大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的反对。虽然在美国曾有以南方种植园主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反对现代化的努力，但在这股力量被荡平之后，反对现代化的力量就再也形不成气候了。

没有强大传统势力的存在，大大地加快了这些国家现代化的速度，使一些在西欧历尽艰辛的现代化进程在这里变得轻而易举。以工厂制度的形成来说，现代工厂制度是现代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西欧，现代工厂制度的建立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新生的手工业和工业处于行会的统治之下。这种封建的行会组织不仅往往割断有机的生产过程，而且阻碍了按现代化大生产来建立生产组织的要求。像在纺织业这种便于分散生产的行业中，这种情况就显得更为突出。但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没有经历过中世纪，也没有封建行会制度的存在。只要生产的技术水平提出了要求，工厂制度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有资料表明，英国的纺纱技术传入到美国以后，家庭手工纺纱业很快就被工厂取代了；在动力织布机发明以后，织布的工艺也马上集中到工厂当中。并很快使纺、织、印染集中在一个工厂之中，由一个有机的生产组织来完成整个生产过程。^①这无疑会大大提高工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加快工业化的进程。

美国等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也无疑都得益于缺少传统势力的阻碍，并由此形成自己现代化的独特特点。比如，在这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经历过旧权威向新权威的转变，也没有经受这种转变中必不可少的痛苦；再比如，由于没有经历过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系统的崩溃过程，也就没有遭遇到过由此而造成的社会解体过程。又比如，由于这里没有阶级结构的历史遗产，来到这里的都是“平等”的移民，形成的就是开放性的阶级结构而不是封闭性的阶级结构。而且由于没有悠久的历史可以供人品味，也没有强大的传统禁锢人民的头脑，创新成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然而人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无历史”的特点，也曾对这些国家现代政治体制特征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前面我们已经约略提到，美国政府的中央集权程度远不如英法等国那样高，而是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这固然是与前面所分析的种种因素分不开的，但美国没有经历传统与现代的长时间的剧烈冲突的历史特点也起了重要作用。回顾一下英法等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欧洲强调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在抑制分裂倾向、反对抗拒现代化的传统力量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恰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分裂的社会需要集权；统一的社会则反之。在欧洲大陆，如同在同时代的多数现代化中的国家一样，理性化的权威和集中化的权力不仅为统一所必需，而且为进步所必须。反对现代化的势力来自于传统利益，如宗教、贵族、区域及地方利益。只有建立集权，才能打破旧的秩序，废除封建主义的特权和限制，并为新兴社会集团和新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②美国的情形则与此全然不同。美国没有中世纪的历史，既没有贵族的分裂力量，也没有寄生于旧制度上的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宗教、种族、语言的差异是很大的，但由于缺少特定的背景，也就使这些差异不可能沿着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形成一条主要的断裂带，或是形成两大尖锐对立的阵营。反对现代化力量的缺乏，也就使为抑制反对力量而设置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不必要。

^① 樊亢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一版，第117页。

^② 亨廷顿《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23—124页。

4. 由于起步相对较晚,现代化具有“一揽子解决”的特点,但得天独厚的条件保证了这种现代化的成功。

西欧第一批国家的现代化,由于要经过“史无前例”的探索,同时也由于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之间的对峙,从现代化的准备,到现代化开始走上正轨,再到现代化的各项任务基本展开,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英国从近代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到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再到工业革命发生,大约用了300年的时间。而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是首先展开其中的一两项任务,然后再展开其他任务。帕森斯曾用科学革命、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三个基本变项来分析不同社会中现代化的时序模式。他认为,在英国、法国、荷兰等国,都是以工业革命或是以民主革命为先导,然后再逐步展开另两项任务。^①但是,当美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候,英国等工业国家已经大体上完成了政治革命的任务,工业革命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而当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榜样既已摆在那里,后来者自然可以将其各个方面同时推进。因此帕森斯认为,美国等国家现代化的时序模式是独特的。它不是以某一方面的现代化为先导,然后再展开其他方面的现代化。而是将科学革命、民主革命与工业革命同时推进。这是一种整体化的现代化时序模式。实际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帕森斯所讲的三个方面。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奴隶制的废除,也都是在这同一时间里发生的。

第三阶段:开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现代化

在欧洲的一批殖民地与欧洲第二批国家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一个世纪以后,世界上发生了第三次现代化浪潮。这批国家大致包括德国、俄国(苏联)、日本、中国等。与第二批现代化国家相比,这批国家从数量上看并不多。但无论是从其现代化的性质来看,还是从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来看,都是值得给予特别重视的。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呈现出更大的差异性。虽然这些国家都是属于“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但意大利的现代化显然是“内发”的。德国的现代化过去人们一直将其看作是“内发的”,但依据主要在于其文化属西欧范围,如从现代性的积累看,应当认为是一种“外发型”现代化。中国和日本地处远东,长期与其他文化隔绝,是一种“外发”型国家。而俄国地处东欧,并有一部分地区在亚洲版图之内,虽大体上也属于欧洲文化的范围,但其自身有很强的独特性,其现代化也主要呈“外发”特点。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次现代化浪潮中,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还要指出的是,这批国家的现代化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基本格局的最终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形成的。1850年,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有些国家对此进行了反应,或者通过贸易,或者通过仿效,先后实现了工业化,而大多数国家却没有对此做出反应。基于这一点,世界分成了工业国和非工业国。”^②也就是说,凡是在后来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在这个时期都至少已经起步了;而在这个时期还未起步的,后来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

这个时期的现代化,虽波及的国家有限,但过程复杂,给人们的启示也很多。其中最突

^① 帕森斯:《社会体系》,芝加哥自由出版社,1951年版。

^② 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商务印书馆,第3页。

出的，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1. 这种“外发”型现代化的首要政治前提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夺取政权，实行政治变革。

第三批现代化国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现代化的“外发性”。也就是说，其现代化主要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刺激与挑战。问题在于，当外部刺激和挑战出现的时候，如何才能形成启动“外发”型现代化的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由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夺取政权，进行政治改革，从而为现代化的启动创造最基本的政治条件。在德国，是俾斯麦（1862年）担任首相以后，以“铁血政策”获得并巩固了德国的统一，并以此为开端，开始了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的进程。虽然这种“铁血政策”多受世人指责，其开始的法西斯式的现代化道路后来也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但就德国本身来说，它的现代化无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几年之后，地处远东的日本也发生了相类似的变化。原来形同虚设的日本明治天皇，在“王政复古”的名义下，在维新派政治家和下级武士的支持下，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铲平了地方分裂势力，在中央政权的层次上建立了推进现代化领导人的权威。日本的现代化正是由此而起步。俄国的现代化则起步于亚历山大二世于1860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种状况与西欧较早实现现代化的那些国家形成鲜明对照。在西欧现代化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那些来自民间的力量，在第三批现代化国家中发挥的作用都极为有限。更确切地说，当这些国家开始现代化的时候，他们的力量还非常弱小，还不足以在这样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中唱主角。另外可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在19世纪中期现代化的努力及其失败。学术界大多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大体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虽也曾几度出现一丝希望，洋务派和戊戌维新中的志士仁人也曾为现代化进行过艰难的努力，但由于这些志士推进现代化的人们始终未曾获得全国性政权，现代化的努力最终都化为泡影。

必须注意的是，将这些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过分理想化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无论是俾斯麦、明治天皇，还是亚历山大二世，他们都既是新人物也是旧人物。更不能忽视的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与其说是出于自愿，倒不如说是为形势所迫。这一特点对其选择现代化道路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2. 加强中央集权，政府广泛干预经济社会生活，大大加快了现代化步伐。

第三批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起步时，面对的都是相当落后的历史遗产。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一旦能成功地启动，现代化的速度就非常之快。这种速度是除美国之外的前两批现代化国家所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在德国的现代化起步之前，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其中力量最强的普鲁士仍是当时欧洲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全部国民经济就是农业，几乎没有工厂和矿山，商业也很少。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政治腐败，国家分裂，全国80%的人口是农民，工业生产极不发达，而且还被西方列强强加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但短短的几十年过后，工业化都有了相当进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其中的原因，除可以吸收早发展国家的成果之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中央集权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并且由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发展。

在德国统一并建立中央政权之前，经济上各个地方自行其是，内部关卡重重，商业法规和度量衡制度五花八门，货币流通极为混乱。据说光使用的货币就多达6000种，易北河和威悉河上的税卡就有几十道。日本经济也为各藩大名所分割。统一的强有力中央政权建立后，这种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开始被打破。在中央政权的推动下，币制和度量衡制度统一了，贸易上的封建壁垒被打破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了初步的条件。同时，中央集权政府全面介

入经济生活。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即着手创办现代工业。日本的第一批现代企业就是由政府建立的。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兵工、火药、造船、交通运输、通讯、铁路、矿业、纺织等行业。为了诱导私人采用西方的工厂制度和先进技术设备，还由政府建立了一批“模范工厂”，以起示范作用。德国也在统一后不久开始实行国有化政策，政府拥有44个最大的矿山，12个大钢铁企业，24%的发电设备和20%的制盐工业，80%的铁路经营。^①同时，大量扶植垄断企业，帮助垄断组织扩大海外市场。在洋务运动中，中国政府也试图在一定范围内推进工业经济的发展，除政府直接创办一批军工企业之外，更重要的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兴办了一批近代企业。

3. 独立自主地走向国际社会，利用“后发优势”是“后发”型现代化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闭关锁国是不可实现现代化的，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在“后发”型现代化开始起步之时，在国际上直接面对两方面的现实：其一，是世界上已有一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因此，对“后发”型国家来说，现代化已不是史无前例，而是有例可循。直接引进已现代化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借鉴其体制与制度，汲取经验教训，是这些“后发”国家优势之所在。其二，在这些国家现代化起步的时候，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已经基本形成，这是“后发”型国家外部活动的基本框架。不管这个框架对“后发”国家意味着什么，它们都不可脱离这个框架。这两个现实就决定了第三批现代化国家必须用独立自主地进入国际社会的行动，来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

4. 在现代化的时序模式上，形成了一种不均衡的现代化模式，并最终使一些国家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帕森斯认为，英法等国的现代化，或是以工业革命或是以民主革命为先导，然后展开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任务；美国的现代化则是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齐头并进。而德国的现代化则属于另外一种模式，即大力推进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却没有同时进行民主革命，结果导致纳粹暴政和军国主义扩张。实际上这种模式还包括日本，并在一定意义上包括意大利。由于俄国在现代化中途发生了十月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中国在19世纪中后期的现代化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可以说，不均衡现代化实际上是第三批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现代化模式。

对这种特殊类型的现代化模式形成的原因，至少可以指出如下几点：第一，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所具有的“防御型现代化”的特点。第三批现代化国家起步时，大多受到外部势力的威胁。因此，他们强调富国强兵，将军事现代化放在突出地位。第二，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第三，阶级关系的遗产与现状。从欧洲国家的情况来看，凡是民主化进展不顺利的地方，往往都存在着一个较为强大的反民主联盟，这个联盟主要包括大土地所有者、国王以及依附于前两者的软弱的资产阶级。在这当中，大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尤为值得重视。相反，在民主政治得以建立，并在两次大战期间能使民主政治得以维持的国家，往往都是小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不存在强有力的大土地所有者，因而反民主力量在农村中找不到同盟军。而工人阶级则可以与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小农场主、佃农和农业工人建立推进民主化的政治联盟。

^① 樊亢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一版，第261页。

第四阶段：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化浪潮

20世纪上半叶是现代化的一个低潮期。其间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寥寥无几，只有土耳其是个例外。这是由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已经形成，在这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这时都已先后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还没有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则大多处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因此第四次现代化浪潮到来的一个必须条件就是结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这个条件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步形成了。二战以后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大部分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1956年，摩洛哥、突尼斯、苏丹等一批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1957年，加纳（原来的黄金海岸）获得了独立。1956年，法国结束了其在印度支那的统治，1957年英国承认了马来西亚的独立。1960年，非洲有13个法国殖民地获得了独立，比利时也结束了对刚果的统治。到1965年，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获得了独立。又一次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具备了。

回顾第四批国家三、四十年现代化的历史，可说忧喜参半。在第四批现代化国家中，有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如东亚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在另外一些国家，却呈现出不容乐观的图景。有些国家至今没有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还有的国家虽在一段时间内现代化取得可观进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过程很快中断了。

总括二战以后的现代化历程，如下几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1. 虽然以军事和政治为特征的殖民主义已经基本结束，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在采取各种方式支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国家政治独立的获得，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进行现代化所必需的国家自主权，但并不意味着原来宗主国在这里的影响已经结束，也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已经获得了进行现代化的良好国际环境。巴西著名社会学家桑托斯把落后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归结为三种类型。一是殖民依附，主要是通过殖民主义掠夺与殖民主义贸易实现的。这种依附性主要存在于16世纪之前；二是金融——工业依附，主要形式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资本统治，这种依附形式开始于16世纪末以后；三是技术——工业依附，开始于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与经济依附，就是第四批现代化国家所面对的基本国际环境。对于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国家（地区）来说，就更是如此。

从这一段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处理好克服依附与发展的关系，关键取决于如下几点：第一，政府适度而有效地介入经济生活。第二，妥善处理国家资本、国内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关系，发挥国家资本的主要作用，使外国资本能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政府对国内经济发展能采取正确的政策与措施，促进国民经济健康而持续的发展，才能增强摆脱依附的经济实力。

2. 现代化过程是“突然”开始的，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早发展国家在很长时间里才能解决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的“两难窘境”。

如前所述，早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性

不断成熟，现代化实际是开始于“不知不觉间”。因此，这种“内生”型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一种渐进的过程。第四批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如同第三批国家的现代化一样，带有很强的“人为色彩”。一次成功的革命，一届新政府的上台，甚或是一次军事政变，都可能成为现代化的起点。

然而，现代化的启动虽然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实现了，但现代化启动之后所面对的问题却异常复杂。早现代化国家在相当长时间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第四批国家要用很短的时间来解决；在早现代化国家用很长时间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往往是先解决一个问题，从而为下一个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而第四批国家则很难顾及这些问题之间的逻辑性及其先后顺序。他们只能在几乎同一个时间里，要兼顾所有这些问题。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本应在不同阶段加以解决的问题之间，往往存在种种互相矛盾的要求。由于第四批国家必须同时解决这些问题，就形成了一系列的“两难窘境”。

3. 现代化的异步性明显增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充满着错位与失调。

从理论上说，现代化是整体性的，现代化的过程会波及社会的各个部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而且，在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实际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过程都是同步推进、同时成熟的。相反，实际的现代化过程却会表现出明显的异步性。这种异步性既可以表现在地区之间、制度之间，也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①这种异步性在第四批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会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种失衡首先表现在以城市和农村为两端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分裂上。现代化在经济上往往从工业部门开始，而这些工业部门绝大多数是集中于城市之中。当工业部门（或城市）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时候，农业（或农村）仍处于传统状态，有的甚至处于半原始状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二元社会（或二元经济）。在社会的这两个部分之间，很少能起到互相促进或带动作用，相反倒往往是互相封闭、互相排斥的。

经济现代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之间，也常常形成这种失衡与错位现象。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具体而明确地表现在经济上。而且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往往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因此，第四批国家的现代化，往往是从科学技术和经济现代化开始（在此之前，往往有一场规模有限的政治变革，以确立现代化的领导）。但在此后，却很少进行相应的政治变革与文化变革。这样，经济现代化不仅缺少政治保障，而且缺少来自文化层面的支持。

同样的状况也表现在推动现代化的社会力量上。正如在分析第三批国家现代化时所指出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能否启动关键在于立志推进现代化的社会力量能否获得中央政权。因此，第三批和第四批国家推动现代化的力量明显不同于前两批国家。如果说前两批国家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来自民间，从而形成其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特点的话，那么，后两批国家的现代化推动力量则主要是来自上层（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启动现代化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这当中，政治家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在第四批现代化国家中，还存在一种特有的现象，即具有现代化取向、训练有素的军人往往成为现代化的有力推进者。但这部分现代化推进者，在全国总人口中只占有一个极小的比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吸纳更

^① 参见哥迈尼《现代化的社会学》。Transaction Books, 1981, 第147页。

多的社会力量，成为推进现代化的力量，现代化的深入是不可能的。但与早现代化国家相比，第四批现代化国家中的现代化推进者本身有着更强的封闭性，而很难与其他的社会力量建立起联系。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民族解放战争的领袖们，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曾把他们与广大的人民群众联系到一起。但斗争胜利后，作为执政者的领袖们与人民原来的那种联系很快就被切断了。

这种失衡与错位，还表现在社会动员与民主制度的建设的不均衡发展上。造成社会动员超前的基本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许多第四批现代化国家都是经过民族解放斗争建立起新国家的。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各种社会力量被广泛动员起来；第二，早现代化国家民主思潮的传播，以及早现代化国家民主政治的示范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人民民主意识的形成大大提前了。但同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民主制度的建设却要慢得多。社会动员与制度建设的错位，是造成许多不发达国家政局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

4. 存在着较强大的传统势力，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斗争更为剧烈，现代化推进者领导权的巩固也更为困难。

在第一批现代化国家中，由于现代性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传统因素也有一个逐步削弱的过程。这是一个逐步消长的过程。第二批国家的现代化则基本上是在一种没有传统的情况下进行的。第四批国家现代化却是在强大传统因素的包围中开始启动。而且在这当中还存在一种重要的差别。在前两批国家，特别是第一批国家中，现代性因素是从本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现代因素与传统因素之间的斗争也是本社会内部的两种因素的斗争；而在第四批现代化国家中，其现代性因素不是从本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外部传播进来的，现代性因素与传统因素之间的斗争，也表现为一个社会内部因素与外来因素的斗争。因此，在第四批现代化国家中，传统因素与现代化因素的斗争要更为激烈。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李国庆

H·海曼青年学者社会学论文奖揭晓

由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与美国威斯理大学为纪念美国应用社会学H·海曼教授而设立的“纪念海曼教授社会学论文奖”今年9月评选揭晓。一等奖：《工人转工意愿分析》（丘海雄）、《工人职业安全感》（金雪鸣）、《工人工作价值研究》（温世伟）；二等奖：《广东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现代化》（黎熙元）；优秀奖：《都市居民社区归属感初探》（王有伟）、《价值取向与专业流动》（方敏）、《珠江三角洲外来劳工社会变迁研究》（骆玲）、《传统价值观、个人现代性与政治参与》（严祥军）、《不同老人群体生活状况的层次分析》（俞萍）、《中国青年工人劳动意识的倾向与特点》（陆建华）。